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香港再還是不再，問題並非如此：大中國的「認同」過程與其批判挑戰

Hong Kong No More,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Th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in Greater China and its Critical Challenges

doi:10.6752/JCS.201609_(23).0006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陳奕麟(Allen Chun)

頁數/Page：119-12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香港再還是不再，問題並非如此：
大中國的「認同」過程與其批判挑戰
Hong Kong No More,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Th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in Greater China and its Critical
Challenges

陳奕麟*

Allen Chun

近年來，香港面臨了新的生存危機和文化挑戰。懷舊香港者都表示遺憾，「香港不再」。也許1997年代表了社會變遷的重要關頭。無論如何，香港的本質感覺上有所不同，其原有特色逐漸消失或受到威脅。過去對香港的社會文化評價及詮釋了解必須同時被淘汰；簡而言之，它不合乎新時代。在大中華時代，香港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於大陸而言，香港和臺灣代表了文化刺激、經濟啓發與現代啓蒙的主要資源。由於大中國的興起，基本局面明顯轉變。香港和臺灣不僅淪為次要因素，而且其獨立性同時受到打壓。上述巨變如何理解？政治政策強調「一國兩制」的治理原則。一般學者和大眾媒體紛紛指出，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所導致的若干變更。史學家易於區分英國殖民主義與大中國國族主義時代之別。上述套裝模式具有多大的事實價值？其深層的理論詮釋有多準確的眼光？筆者認為現有主流論述、架構和評價，透露出對某些皮毛現象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能釐清什麼？筆者強調香港的（後）殖民主義狀況，一方面試圖修正既有的殖民主義定義，一方面暗示香港未來文化批判的可能性。（後）殖民主義表徵某種批判意識。大中國在香港97後能否代表新時代的殖民主義霸權？文化研究要如何解讀澄清？香港與臺灣是否遭遇同樣的掛勾危機？文化如何形塑批判和挑戰？

* 陳奕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電子信箱：achun@gate.sinica.edu.tw

一、1997年的迷思

社會學家黃紹倫(1999: 181)在其“*Changing Hong Kong Identities*”一文中開宗明義地說道：「1997年對香港而言是重要的一年，這個期待已久的回歸儀式終於完成了。隨著國旗在該年7月1日回歸典禮上的更換，香港終止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並取得了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新身分。」為了強調此事件背後的複雜性，他引用了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於回歸首年根據個人經驗的觀察所言，說道：「真正的過渡其實更為複雜、微妙和意義深遠。這是因為實際的過渡乃是牽涉到認同(identity)而非主權」。²換言之，真正的身分認同潛藏在主權影子底下。那麼，請問：主權到底有何虛構性，並使得認同採取真實性？

筆者則相反地指出：歷史從來都是虛構多於真實的。香港於1997年7月1日正式回歸中國（祖國）的歷史性弔詭正在於，香港原本是永久性的割讓，但卻隨著新界的九十九年租借期一起巧合地完結。相信很少人還記得，新界原本是香港的延伸，以便確保英國的貿易利益。管治，當中預設了對當地（原居民）傳統（假定是不變的）的尊重。不過，隨著現代化擴展的現實，它被併合到更廣泛的香港殖民歷史去。這件事情的奧秘之處，正好說明中國政府為何一直順著租約的官方真實性，並否認香港作為一個割讓殖民地狀態的正當性（由於被迫簽訂條約的結果）。在此情況下，不僅回歸日變成國定假日，連帶回歸日前夕的英女皇壽辰五天長假期也一同被「冊封」成為一個不可思議的紀念事件。於是，香港這個殖民地是否存在的真實性，一方面因為官方的消失性而變得虛假，一方面卻又突然被本身已無甚意義的租借的虛構性所救贖並復興。若主權乃植根於此虛構性，身分認同又怎麼可能是真實的？³

許多論述認同的學者都強調擁有身分是理所當然的事實。若身分不止一個，那麼就是多個。因此，生命變成以身分作基礎的協商過程。問題是，卻很少人能有系統並精確說明我們為何或在何狀況下引發身分認同這回事。事實上，身分認同極容易被虛構所操控，而戰後香港正是一個可用以示範身分認同如何不斷被塑造和再造的最佳例子。當人們愈被引導去相信香港的身分認同乃是本質性帶有個人欲望和理性意圖的產物之時，它就相反地愈是蘊含

2 關於陳方安生言論的報告，可參考 Chris Yeung 的文章“*Role of civil servants comes under scrutiny*” (1998/07/01)。

3 參見 Chun (2010)。

虛構的特性。1997年以前，儘管大家都知道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乃是少於五十年歷史的發明，他們還會被引導去相信其具體的確實存在，又或在某些方面有其重要性。事實上，其獨特性並不歸因於其唯獨的創作特性，而是其變遷中的社會政治脈絡。上述脈絡所建構的先決條件具備明確的特徵，以及發展不同意義，使之可能成形的。事實上，與其去問九七後的身分認同是什麼，我們倒不如問：到底，在社會政治的成形狀況下，1997年是否確實帶來了重要的改變？

1997年是否有重要意義，其實頗具爭議的。或者，換另一個角度來說，它代表著帶有可能性的重要轉變。可是，與此同時，筆者認為，在潛藏的層面下，它其實掩蓋了另一種表面性質中立，而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正在演變形成的新社會政治霸權宰制。

二、回歸後的南向殖民主義

「一國兩制」的原則實際上能否確保香港在政治領域上的自治權和經濟上的分隔，這是一個不斷引起爭論的議題。接近1997年之時，高度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逐步正常化，加上不明言的自我批評被內化，這兩點都應該有利於九七後解殖過程的展開。事實上，「英皇」(Royal)的標記早已從所有政府機構移除，但其他殖民時期有關的遺跡卻未見移除。比較起來，戰後臺灣時期自然而然被(中華民國)稱為「光復」後，國民政府全盤將主要街道順著儒家傳統而命名，例如仁愛路和忠孝路，另外明顯套用中國地名和紀念愛國英雄來中國化。這其實是民族主義革命後果的普遍現象。九七後，儘管香港人曾對共產黨(政權)和解放軍滲入的恐懼有心理準備，惟沒有具體實現，這也進一步強化了政治自主權確實存在的錯覺。⁴

此外，官方在媒體上的不干預政策同樣看似增強香港自主權的存在性，並建構香港乃自治區域(這個原則)的虛構性想像，但只不過是事實的一個面貌。事實上，中國中央集權政府的不干預立場，旨在掩蓋香港公共領域在本質上的轉變。從地方性的角度而言，香港的自主權對中國內地的發展則沒

4 對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對中國的意圖提出嚴厲的批評，並列舉其各種政治動機。

有任何影響，也就是說在某程度上可被視為獨立於中國。只要政治方案對支持北京當權有利，媒體的反對聲音會由香港地方性政府自行處理，不會導致北京的直接行動。問題是，新聞媒體的自主權其實侷限於「地方性」的事宜上。Frank Ching銳利地注意到，香港媒體要報導關乎中國的新聞時顯得分外謹慎(1998: 50)。更明確地說，要取得新聞和資訊，媒體其實需要官方機構或中方媒體的合作。有些議題太敏感，甚至被視為禁忌，譬如涉及黨部有關的資料或消息都是明顯的例子。Michael Curtin也指出，媒體開放與密閉的分界線有其實際作用，用以說明香港媒體並非一個地方性的實體，它的市場必須擴展到中國去才能實際生存。他認為：「如果（媒體）此行業要獲得從其受歡迎程度而來的利益，則其擴展中國市場的策略，實有賴於與政府官員的合作。」(1998: 288)於是，媒體為著獲取更大的中國市場，不惜必須通過自我審查來犧牲其自主性，以便正常運作。

簡言之，「一國兩制」這種虛構的自主權(fictive autonomy)，其實只是偽裝地把香港併合到（不斷發展的）大中國領域的現實去。事實上，從媒體方面看見此變遷，也只不過是眾多生活範疇改變的其中一項而已。在經濟方面，中國乃是通過香港來連接到全球經濟體系去，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正好示範香港在此方面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政治合作和經濟權力產生另一種依賴關係，尤其在變遷中的全球資本主義。

三、大中華到大中國的巨變

文化從來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實體，身分認同的問題更甚之。在中國，提升民族主義情緒往往有其重要功用，尤其在最近幾十年而言，旨在為政府的行動和政策提供所需的大眾支持。以香港的個案來說，則能有效促進（與大中國在）政治上的融合。

筆者在1994年11月曾到香港做短暫的訪問，當時正值2000年奧運會申辦權的激烈競爭時刻（最後由澳洲的雪梨奪得）。其中一件令我感到驚訝的事情，並不是從前對政治漠不關心的香港人如何欣喜若狂地被愛國熱情所淹沒，而是，這個現象到底如何產生的。如果北京成功取得奧運申辦權，香港商人當然可以從中獲取利益，同樣地，這也是驅使他們跟中國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建立結盟的原因。換言之，他們並非著眼利益多於民族主義感情因而產

生動機，更重要的是，他們懂得利用這種民族情緒，從而取得自身的商業利益。這正是經濟與文化的新結盟方式。

與此同時，這也能澄清為何首批熱烈支持香港跟中國回歸、又或至少表示對後殖民香港抱有信心的均為富有的資本家，這一點絕對不足為奇。此外，這群人也努力避開跟北京有關的衝突，特別在爭取地方自主權的民主運動和活動上。在此脈絡下，有別於1970年代那種以「政治中立」(apolitical)為特色的資本主義，縱使後殖民時期的資本家依然著重於自身利益，但在香港的特定脈絡下，顯而易見地，如有必要的話，這些資本家會刻意提倡民族主義的情緒，同時犧牲民主權利，藉以保障自身的既定利益。這種商業與政界利益之間的詭異聯盟，其實並不只是為新秩序的基礎而設計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成功，其實完全取決於能否抑制威脅幕後政商聯盟的民主運動。

簡而言之，商業利益實際上經常跟政治纏繞在一起，並在其幕後運作影響著對某些意識形態原則的捍衛或妥協（不管那是身分認同或民主問題）。這種體現使「遊戲規則」變得牢固。此外，這種共謀式的權力利益關係，乃真正民主公共領域的最大威脅。這也正是九七後香港的真正面貌。

把這種新興的進化系統稱為關係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實在過於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的一種模式，它被功利邏輯所驅動，充分實現市場在掌控資金流動方面的主導權。中國其實清楚地察覺到，不管是對發展國家的外包生產，抑或是全球產品的消費市場而言，它都處於擴展中的全球市場的中心。如此的覺察反過來讓它得以利用自己的關鍵作用，來支配人們能否取得所需資源或制度的利益。換言之，人們必須遵從這個遊戲在不同方面的規則。由是，媒體也學會了（如此的遊戲規則），他們知道凡是關於香港的事情都可以自由地報導（故此是自主的）；可是，關於中國又或涉及官方機構合作有關的事情，他們必須跟隨主流，這正是「入場」的代價。能否擴展到中國市場，其實取決於是否遵循政治正確。西方媒體及國際企業，例如Star-TV和Yahoo，都學習避開與中國（政府）不利的立場，以確保他們的生存，同時也正好說明這不是特定給香港的地方性政策。臺灣的商人、演藝界和其他專業人士已經學會對臺獨不公開表態，以免損失在中國市場更優厚的財經利益。如此的制裁看似膚淺和瑣碎，但卻引證了一點：當市場是原則上開放的，人們可以自由地賺錢，政府並不企圖剝奪收益或管制其分配，獲准通往市場實際上是一種可以被政治操控的特權。總而言之，經濟特權和政治正確

產生了新的聯盟並造成了新的利害關係。回歸中國的政治事實不僅牽涉到新的國族主義，以大中國為核心的全球資本主義不僅代表新的市場經濟。政治與經濟的新聯盟所導致的深層支配模式，其實是一個南向殖民主義。

四、香港與臺灣的掛勾關係

歸根結底最大的虛構性其實是「一國兩制」本身。回歸的表面儀式標誌著1997年的虛構重要性，至於香港的自主權，其實只不過是無意義的意識形態架構下的虛構敘事，旨在把時鐘重新設定，好讓香港和內地可以來個最終的結合。在香港，跟祖國擁抱這件事，實際上把既存已久的資本主義重新定義到新方向，並同時引發了以下問題的思考：殖民性和現代性到底是什麼？兩者的共謀關係又是怎樣？縱使全球資本主義是一個具自主性和客觀的實體，可是在這一點上，它不僅是一個市場社會的具體操作，同時也是一個變遷中政治經濟過程的最終成果。更重要的是，如此微妙和複雜的變化其實與政策形成和階級實踐的共謀關係密不可分，這一切都發生在深層抽象運作上。

就當代臺灣而言，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框架下，香港和大中國間所呈現的互相依賴關係實在不能夠輕視。事實上，服貿協議的出現正好產生了同樣的威脅。促進相互的商業利益或許是好事，但經濟利益與當權影響之間的共謀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大陸那方面，卻掩蓋了政治威脅。如果大陸企業開始買進臺灣經濟的話，將會發生什麼後果？誰能夠保證大企業界的利益及其背後支助只是經濟考慮所主導的？

五、文化批判的未來角色

總地來說，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似乎不明確。幸虧從專制統治而來的殖民遺產，九七後時代的管治得以維持現狀，而香港人也同時為港人治港而鬥爭。在爭取立法會增加直接民主參與和政府管理的事宜上，香港人持續努力奮鬥，也會繼續遭受挫敗。問題是，如此的努力卻沒有放到追尋文化和身分

認同的架構上。換言之，香港的情況有別於臺灣。在爭取民族（國家）獨立運動的過程中，臺灣努力地展示了一種相對於中國文化認同而個別存在的臺灣族群意識和精神。相對來說，香港的民主運動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權利和法律事實的爭論，從而缺乏文化涵義。跟臺灣的情況相比，這其實也說明了兩地公共領域建立方向之不同。在香港，國家（及其功能性利益）和公眾被排除於民主參與的要素之外，是兩件差異較為明顯的事情。在戰後臺灣，早期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民族主義政策所形塑的意識形態，在長期下產生了晚期族群意識的分歧，作為政黨政治的論述基礎，使國家統獨爭論難以脫離族群意識。再者，在香港沒有具體的根據，用以確保地方性的文化認同能夠產生或將會施行實質的政治影響力。

筆者在解讀香港的公共領域問題時故意指向文化認同、地方自主權，以及民主化的事宜，其實是想說明，在香港公共領域的討論上，它們是彼此不同的獨特因素。這些因素代表著不同的抗爭行動，並不會組織起來且互相影響。可是，在其他地方，例如臺灣，這些因素卻是經常錯綜複雜地交纏著（若已不是絕望地糾纏著）。此外，筆者要強調的是，香港文化狀況的「任意性」其實是一種散漫的虛構想像，它掩蓋了制度真實運作的其他面向，而這些面向牽涉到另類的特殊公共領域及其結構性變化。

文化與政治、事實與虛構、以及行動者的策略性意圖皆坐落於權力結構之下，三者之間引起複雜的交互掛勾。筆者認為，這裡依然有許多能辯論的空間。從這一點看來，相對於殖民主義是否和如何構成「主義」或各類體系這個問題，各種相互影響的主義如何在實踐上呈現，以及如何在不斷演變的權力脈絡下竭力使其存在和使潛藏的價值成為制度，這兩點其實更為重要。

六、本期專輯的另類聲音

羅貴祥所著〈從海盜邦到耕作村：國家主權下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一文中，「嘗試探討這些敘述所能提供的有限可能性與策略，反思（象徵性）抗爭的平凡面貌，為隱蔽性反抗賦予新意義，以及尋找它們造反的潛能。」(2016: 130)嚴格說來，與97後的香港沒有直接相關，但作為比喻，仍然間接地挑戰97後當代的政治危機。張佩思所著〈香港本土論述、文化解殖、後殖民創傷之弔詭關係：以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為例〉一文，相反地嘗試從97

後的「國族／殖民」狀況，透過保殖／解殖間的表面弔詭，反思後殖民記憶的深層意義。陳蒨所著〈香港金紫荊廣場：身分認同爭議〉一文，直接解讀97後的國族主義：它不僅是與香港人的文化意識毫不相干，而其中立性質是頗具影響力的想像威脅。彭麗君所著〈公民抗命與法治共同體：香港的可能〉一文，希望從香港青年如何想像「共同體」的可能性作為出發點，並帶有反思「民主」的意味。童慶生所著〈香港，誰的香港？〉一文，也許從相反立場來挑戰文化二分的策略模式。解殖一定是本土庶民抗爭嗎？

引用書目

- Ching, Frank. 1998. "The Hong Kong Press: Will it Remain Free after 1997?" in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24(4): 217-25.
- Chun, Allen. 2010. "Hong Kong 'Identity' after the End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Asian Modernities: Transnationality, Interculturality and Hybridity*, edited by Chu Yiu-wai and Eva Kit-wah Man, pp. 167-90. Bern: Peter Lang.
- Curtin, Michael. 1998. "Images of Trust, Economies of Suspicion: HongKong Media after 1997," in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18(2): 281-94.
- Wong Siu-lun(黃紹倫). 1999. "Changing Hong Kong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in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Transition*, edited by Wang Gungwu and John Wong, pp. 181-202.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Yeung, Chris. 1998/07/01. "Role of Civil Servants Comes Under Scrutiny,"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羅貴祥。2016。〈從海盜邦到耕作村：國家主權下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文化研究》*，第二十三期，頁127-140。